



朔州文物考古文集

下册

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系列图书

雷云贵 选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朔州文物考古文集 下册/雷云贵选编.—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457-0665-9

I. ①朔… II. ①雷… III. ①文物—考古—朔州市—文集 IV. ①K872.25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9214号

朔州文物考古文集(下册)

选 编:雷云贵

责任编辑:朱 屹

助理编辑:冯 岩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16

印 张:51.5

字 数:1000千字

版 次:2013年1月 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7-0665-9

定 价:1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李 尧

朔州位于华夏之北,雄踞边塞,外连大漠。自古“南耕”“北牧”撞击交融,群雄更迭,兴替盛衰,使这里的历史文化斑驳陆离,独具异彩。由于历史的局限,有文献记载的两千余年历史,只是断断续续,或是抽象;那无文字记载的邈远历史,也只是传说,或空白。幸而有考古者的执着奉献,寻古探秘,发现了文物古迹;有文物志士的探索考评,使已消失的历史复活。考古发现是历史的原真,文物记忆是历史的化石。当我们打开这部厚重的巨书,一页一页地翻阅,展现出的是一幅幅的惊世画面,飞扬出的是一股股的神秘与灵光。峙峪遗址的出世,一下把朔州的历史推向了距今约 2.8 万年的原始社会。平朔 3000 余座汉墓的空前发掘,再现了马邑在两汉时期的辉煌与衰落。北魏曹天度九层千佛石塔的现身,一跃成为我国现存最早和雕琢佛像最多的石塔。诸多专家对应县木塔的巍峨壮观、净土寺大雄宝殿藻井与天官楼阁的繁复华丽、朔州崇福寺弥陀殿的“五绝”的提示,折射出了辽金文化的雄风大度和营造光华。应县木塔佛像内 160 件辽代文物的惊现,使辽代的佛教文化与印刷绘画重放熠熠神采。平鲁屯军沟唐代 69 斤金钐的现世,成了唐代郭子仪在朔州一带平叛“安史之乱”的一个见证。右玉内容庞杂的 130 多幅明代水陆画的幸存,展示出的是佛门、神道和人间的万象图。难得一见的商代铜簋、珍奇无双的赵国宋子三孔布、造型奇巧的汉代雁鱼灯、精美绝伦的汉代胡傅温酒樽、典雅秀美的元代玉壶春瓶、独领风骚的明代珐华人物群塑等,件件都凝聚着古人的心血与睿智。就每一件文物每一处古迹而言,它只是历史的一个碎片,印证的是一件史实,如将它整合拼接起来,就是一部返璞归真、传承有序的历史巨篇。因为有文博人员刻意取得的这份累累成果,所以我们朔州的历史长河拉长了,我们朔州的历史根柢链接起来了,我们朔州的亮点也随之呈现出来了。

这部厚重的文集,浸注着 60 年来众多文博专业人员的心血汗水。他们有的是名冠全国的国学大师,有的是赫赫有名的文博巨擘,有的是新成长起来的文博中流砥柱,也有的是本地默默无闻的文博工作者,更难能可贵的是一生重点或专门研究我市的文博专家。他们对

朔州文物考古文集

SHUOZHOUWENWUKAOGUWENJI

我市奉献卓著,功不可没。在此,我们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景仰与诚挚的谢意。汇集编纂这部文集并使之呈现于世,既是一件文物与历史价值并存的重要举措,又是一件能对我们益智启迪之幸事,借此,我们欣然祝贺。

文物要传承,历史要延伸。让我们依托文物提示历史,昭然彰显朔州魅力,继往开来,创建更加美好的朔州。

导 读

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那一代一代悲壮辉煌的历史,有的变得模糊了,有的渐渐消失了,有的被人们遗忘了,那幸存下来的只是历史长链的一个环,或只是有事无物的一个浓缩点。幸而有考古发现了文物,文物能够印证补缺历史,这就是文物考古的重要所在。尤其是在跨入飞跃的新世纪,人们的理念不断提升,视野逐渐扩大,探索遥远的古代文明,鉴赏古人创造的珍品,已成为人们的需求与雅趣。古人创造了文明,文明属于古人,今人文明的提升源于古人的文明,后人文明的再提升,仍离不开古人与今人的前身,所以古人今人都追溯历史。随着社会文明的推进,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文化遗产是历史的化石,是历史的载体,是历史的记忆,是人类的教科书。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凡是有使命感的良知者,总是责无旁贷地呵护它,探索它,弘扬它。因此,那幸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经文博专业人员的解读,腐蚀的化为神奇,深奥的释为通俗,尘封的点化成鲜活。从中,让人们感知到的是先民的睿智与神奇,审视到的是古代的文明与璀璨,焕发出的是我们的自豪与责任。这就是文物考古的重要所在,也是我们要编纂这部书的缘由。

朔州,三面环山形似箕,地理雄胜扼天险;滔滔潞源汨汨涌,自西至东而沃田。凭山之根,得水之灵,远在两万八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峙峪的“猎马人”就率先拉开了朔州文明的序幕。追溯沿革,秦因备胡筑马邑城,率为雁门关外第一古城。汉初韩国都马邑,韩王信因寡不敌众,“亡走匈奴”遭屠城。不是侵扰,便是相战,边塞的动乱一直未止。至武帝时,著名的“马邑之谋”再一次拉开了汉王朝与匈奴长达14年的大战。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在朔州这座地理举足轻重的历史舞台上,领地易主,朝代更迭,盛转衰,废再兴,城在战争中衰废,城在治乱中再兴,城擦城,始终不离弃这块重地。“南耕”“北牧”的争战与“和亲”,多民族文化的渗透与交融,使这里催发变革,萌生新机。一代一代地传续演变,使朔州的文化变得多元多彩。

历史悠久,文化深厚,自有遗迹斑斑,文物多多。已发现的遗迹,上至原始社会,下至明清,不可移动文物有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和石刻,共计有3千余处(件),已登记的可移动文物,达4万余件。备受关注和珍视的是那些有重要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遗迹和文物,诸如:代表华北新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先驱的有旧石器时代的峙峪遗址,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型石器制造场有鹅毛口石器制造场,属世界四大名塔之一的有应县木塔,堪称全国三大佛殿之一的有崇福寺弥陀殿,全国木构建筑装饰最为华美精细的有金代应县净土寺大雄宝殿的藻井和天宫楼阁,现存最早和雕刻佛像最多的稀世极品有北魏曹天度九层石塔,全国最大汉墓群的有广武汉墓群,汉墓发掘规模空前出土文物之多的有平朔汉墓发

朔州文物考古文集

SHUOZHOUWENWUKAOGUWENJI

掘,一次出土金器之最的有平鲁屯军沟唐代金铤窖藏,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发现有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汉代铜器纹饰异常精美的有右玉大川出土的胡傅温酒樽,汉代制作奇巧、工艺考究的铜灯有朔城区出土的雁鱼灯,战国精美钱币孤品有平朔生活区出土的宋子三孔布,难得一见的汉代度量衡器有平朔生活区出土的骨尺,珍奇无双的绞釉瓷器有朔城区曹沙会出土的元代玉壶春瓶,元青花瓷的佼佼者有朔城区农业大楼工地出土的青花高足杯,独领风骚的明代珐华塑有朔城区社稷坛遗址窖藏出土的乐舞伎与八仙庆寿人物,旷世聚珍一堂的佛神诸画有原存右玉宝宁寺的130余幅明代水陆画等,凡此种种,屡见不鲜。

遗迹再重要,若不被点化,多会被漠视;文物再珍贵,若不被解读,也只是一件旧器物。一个区域的重要遗迹或珍贵文物,它是当地的,也是我们全民族的,有的甚至是全人类的。就拿我们朔州地区来说,峙峪遗址的细小石器,是华北新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先驱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环节,研究石器时代者,都在注重它,研究它;巍峨壮观的应县木塔是唯一的,因而被列入世界四大名塔之一;精美无双的雁鱼灯能独领风骚,因而能展现在《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篇》扉页上;战国的宋子三孔币,因珍奇无双,因而全国出版的钱币图录书均有收录……所以,重要的遗迹和珍贵的文物一旦显现,即会被世人关注,就会有专家学者探索它、解读它。朔州的文物考古在全省来说是个重点,在全国来说也是个亮点。自建国以来,文博界专家相继考察,文物古迹不断发现,研究成果陆续发表面世。他们以专业的视角,敏锐的智慧,破解了一个一个千古之谜,召唤回消逝了的历史,缀合着古今之间的缺环。因而,我们朔州的历史变得更加厚重,文明显得熠熠生辉。文物产生的效应也昭然于世。外省者,因知有木塔,才知有应县;雁鱼灯斐声遐尔,朔县(雁鱼灯出土时,朔城区称朔县)也随之名扬。人名名扬靠媒体,文物价值靠考释。建国以来,考察、研究、解读有关朔州文物的文章和专著,浩以烟海。探知鉴赏文物,已是人们的雅趣,认知研究历史,也成为人们有品位的一种需求。故常有志士到处搜索这批资料,寻找其出处。基于此,我们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便萌生了编纂出版这部书的意向。

因有缘与文物考古工作接触,多年来集存了一批有关文物考古的书刊资料,尤对涉及朔州区域的,多是想方设法去追寻。由于起步晚,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的大半未见到,也难找。半年来,通过查文献索引,找线索,寻同仁,进图书馆,电话联系,电子邮箱传递,绝大部分已征集回。经梳理归类,分为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器物、石刻、考辨六部分。共132篇,约120万字,涉及编写人员115人。其中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专业人员就有104人。为阅读前能先知主题,每篇前又附加了提要(不含原文已有的)。文章排列,均按类别以时期先后为序。如文章或专著中有朔州方面重要内容的,均节录。是专著的,只在书后列附录。搜集的文章,有长有短。体例有论文、报告、简报、评介、探索、质疑、考辨、正误、信息等。作者被冠名为国级大师或考古泰斗、文物巨擘、工程院院士的有,郭沫若、贾兰坡、罗哲文、梁思成、傅熹年等;有影响的文物考古专家有,尤玉柱、史树青、黄永川(台湾)、祁英涛、闫文儒、张颌等,建国后的第二代文物考古专家有,卫奇、柴泽俊、信立祥、张畅耕、戴尊德、陈哲英等,新成长起来的文物考古专家有,石金鸣、王益人、董耀辉、刘俊喜等;高等院校的历史、建筑和文博方面的教授有李世温、李壮伟、刘建生、刘平等,与文物考古关联的科研、出版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有,黄盛璋、刘景芝、于炳文、陈述等;当地文博系统专家或多年从事文物工作的专业人员有,赵达、支配勇、孙学瑞、高平如、杜福、安孝文等。其间,有的专家的后半生一直在从事和研究朔州的文物考古工作,如主持平朔汉墓发掘的戴尊德,设计主持大修崇福寺弥陀殿的柴泽俊,深入探索峙峪遗址文化内涵的尤玉柱,研究木塔残损状况和如何科学保护木塔的李世温等。他们奉献不分地域,不讲代价。他们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义不容辞的责任心,令我们钦佩,值得我们学习。

《文集》浸注着诸多专家和文物工作者的心血,折射出的是他们的睿智。打开这犹如历史隧道的《文集》,我们踏着古人的足迹,找到了朔州历史的根,摸到了朔州历史传承的轨迹,看到了朔州文明一个一个的闪光点。1963年,峙峪遗址偶尔的发现,放射出了朔州细石器的文明曙光。贾兰坡在《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说:“它是北京人文化与细石器文化的联系环节之一”,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为亚洲、美洲细石器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当时的人们可能已经发明了弓箭这种前所未有的武器”,“给我国远古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光辉”。尤玉柱在《峙峪遗址刻划符号初探》中说:“骨头上……刻下各种记号、符号或图像,这是一种创造,虽然还不是真正的文字、数学和艺术,但在文化发展上毕竟是‘猎马人’创造的。”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已发现的还有右玉张家山遗址。从朔城区后圪塔峰、前圪塔峰和梵王寺窑干河西岸采拣到石器与层位上看,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朔城区南磨遗址发掘出土的石制品,同虎头梁遗址的年龄大体一致,也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可以推断,从十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至两万八千年前以后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朔州这块树草丰盛、动物活跃的大地上,人类在这里的活动已相当平凡。其间,峙峪的“猎马人”靠山之根,水之灵,催发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因素,成为华北细石器文化的一个亮点。怀仁鹅毛口大型石器制造场遗址虽然不能说是人类居住遗址,但也能说明制造场的不远周围,会有制造石器的主人居住。带尾尖状器、石锄农业工具的发现,证明当时人类的经济生活是以狩猎与农业为主。其时代应是一万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遗物,在朔州地区多有发现,已发表的资料有:怀仁窑子头的细石器遗址、应县边耀的细石器遗存、右玉丁家村细石器、陶片、石环的发现,朔城区司马泊、丰予村、赵家口遗址石刀、陶环、石斧、夹砂陶片、蓝纹陶片的发现,平鲁王高登骨环、鬲足、豆柄的发现等,充分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朔州地区的人类活动已很普遍。

进入奴隶社会的夏商周春秋时期,朔州之地先后虽属并州、晋国之地,但这只是个地域概念,并非行政区划。在山西的北部,仍居住着戎狄,他们过着部落游牧生活。右玉大川沟崖上发现的商代铜簋,应是中原地区皇朝或诸侯的用器。散落至此,或许是北狄侵犯中原的猎物,后又因战败而失落。另还有一些商周时期的器物,分别于朔州各区县文管所收藏,虽未有正式文章考释。但也可证明,处于“南耕”“北牧”接壤之地的朔州区域,是两个民族的大舞台,民族交融的大熔炉。进入封建社会,赵、韩、魏三国分晋国,赵国控制了山西大部。此前山西北部为林胡、楼烦所居。赵武灵王(前307)实行变法,强大起来,吞并了林胡、楼烦两个民族,扩疆数千里,并建置了云中、代、雁门之郡,朔州之地属雁门郡。平鲁井坪南梁发掘的300余座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墓葬,从发表的简报资料看,有着显明的族属特征。墓葬浅而小,随葬的泥质夹砂单耳陶罐、串珠等,与中原地区同期墓葬的器物有着明显的差别。“丁”字形骨器为之罕见,应是特定区域,特殊条件下的一件器物。显然,这批墓葬的族属是北方游牧民族林胡、楼烦,它反映的也正是上述这段历史。朔城区发掘的300余座战国晚期墓,均分布在朔州古城周围,而在其城内未发现战国以前的明代墓。说明,在战国晚期,朔州古城之地,已是战国晚期的一处聚落。另外,发掘的还有怀仁杨谷庄战国墓群,其时代特征与朔城区境发掘的类同。这几批墓葬的发掘,均有简报,发表在专业报刊或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上。这批墓葬资料,一方面印证了历史,另一方面填补了历史的缺失。战国晚期,秦国强盛,屡屡攻赵。赵无力顾及边远的北方属地。加之北方匈奴日益强大,常骚扰赵境。后赵国大将李牧为防匈奴南下,驻雁门镇守,或北击匈奴。战国晚期的这几批墓葬,可以说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缩影。如朔城区曹沙会西南的45座战国墓,多数无随葬品,无棺槨,有的肢体不全。这种现象,显然是战争给当地民众带来疮痍的反映。在这批战国墓葬中,发现有铜剑、铜矛,从耕地里发现的有两柄春秋铜钺(文章考释为剑)。

这几件兵器,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战国晚期朔州境多战争的情景。

朔州地区近 30 年的考古发掘,绝大多数是汉代墓葬,共计有 2500 余座。通过诸多专家对这批汉代资料的研究,400 多年的秦汉历史轨迹,昭然若揭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中说:“这批墓葬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勾画了马邑城在秦汉四百余年的兴衰,反映了雁北长城沿线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秦至西汉早期的墓葬,规模都很小,而且相当多的墓无任何随葬品。这除了受当时薄葬风气的影响,更主要的当与不安定的战争环境所造成当地经济衰败的局面有关。”又说:“西汉中期墓葬在规模和随葬品方面的两极分化,反映了一方面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当地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汉武帝穷兵黩武的对外用兵政策,使边郡的一般居民仍然挣扎在贫困之中……西汉晚期至东汉初的墓葬一般规模大,随葬品较多,反映了这一地区在较安定局面下经济、文化的发展。东汉中期墓葬数量较少,固然与一墓合葬几代人的葬俗有关,也反映了东汉时期城市经济的衰落……这批墓葬中屈肢葬流行,动物形铜牌、贴塑水波纹陶罐的发现,使我们看到秦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

通过这批秦汉墓的发掘,为秦汉马邑故城地理位置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批墓葬主要分布在朔州旧城东北。在明代朔州城和北齐朔州故城内,未发现有一座秦汉墓,从以上情况和发现的 20 多件陶壶有“马邑市”戳印铭文推断,显然这批秦汉墓葬是马邑城居民的集中墓地。因此,我们有理由认定,秦汉马邑城就在今明代朔州城和北齐朔州故城的区域内。

在《平朔十年考古发掘重大成果》一文中载有:“还有不少特殊的葬式和现象,如头部中箭的、身体蜷缩的(男女二人)、跪的、骨骼变形的,无头颅的、怀胎的(难产而死),以及男女同棺(合抱姿态)、母子同棺等”。这种特殊的葬式与现象,无疑是反映着死者是因战争、被捆绑活埋、重苦活、难产、殉情(也许)、瘟疫等原因而命归九泉。从《山西右玉县善家堡墓地》和《朔县发现的匈奴鲜卑遗物》文中可知,善家堡墓地发掘的 23 座墓,均是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鲜卑民族墓,死者有男女成人,有儿童。《朔县发现的匈奴鲜卑遗物》一文中所说的遗物均是从被破坏了的东汉晚期墓中发现。《晋书·北狄匈奴传》记有:“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其它史书也记载说,东汉晚期的雁北,已是匈奴、鲜卑诸族同汉民族杂居之地。以上两篇考古发掘资料,进一步对这段历史作了印证。

山阴新广武两处汉墓的发掘地点,均在广武汉墓群的边缘地段,它的发掘,正式揭开了广武汉墓群的疑团:它不是汉代将帅阵亡者的墓地,而是汉雁门郡和阴馆县城官吏与富人的集中墓地。因为,在广武汉墓群西北 3 华里处,即是汉阴馆县故城(东汉时为雁门郡治)。

据《再现马邑辉煌——平朔考古发掘纪实》,从 1983 年至 2003 年,在平朔地区共发掘秦汉墓 2500 余座,出土文物 15000 余件。汉代古人“事死如事生”。我们今人考古发掘考释,应是见死如见生。一座墓就是一个家庭,一群墓就是一个村庄或城镇。平朔发掘的 2500 余座秦汉墓,就是朔州地区秦汉社会的一个缩影。从整个墓葬的形制、规模、葬式及随葬品的多少有无看,我们透视到的是朔州地区秦汉时期的社会众生像。照什八庄一号墓的封土堆高 5.6 余米,出土各种器物 94 件,其中铜雁鱼灯、嵌贝铜龟镇、铜鸭形熏炉等都是国宝级文物。根据《汉律》记载,“列侯坟高 4 丈”。有学者推断关内侯的坟高 3 丈 5 尺,秩奉为二千石。从出土的印章知,墓主人叫东门延寿,从随葬的戈、弩机、剑格、铅镞兵器推断,应是武官。同已知汉墓材料对比,应是高级官吏。类似这样的墓有 10 多座。另有一大部分墓,墓型小而浅,又无任何随葬品。墓葬的悬殊,充分显示了社会的贫富悬殊。在出土的 15000 余件器物中,几乎涉及到了秦汉马邑的各

个领域,涵盖了当时社会的所有器物。据已发表的资料知,约有 150 多个器物种种。这批器物发展有绪,自成序列,地方特色鲜明。从认知历史角度宏观,它是秦汉马邑辉煌历史的再现,从考古学术观点微观,它又是雁北长城沿线区域秦汉考古断代的一个标尺。

对这批秦汉墓发掘资料的介绍和考证的文章,还有黄盛璋先生的《朔县战国秦汉墓若干文物与墓葬断代问题》、张颌先生的《“贵海”铜印释文正误》、李文杰先生的《古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戴尊德先生的《朔州战国秦汉墓发掘报告》(待发)等。在《平朔出土文物》、《朔州崇福寺藏品精选》的专著中,对平朔地区出土的战国至秦汉时的珍品,均作了考释介绍。另外还有专家及从事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平朔汉代不可多得的珍品,如铜雁鱼灯、铜四神染炉、铜伎镇、宋子三孔布、组合铜灯、骨尺、铜镜精品、印章精选等,分别发表文章,作了介绍。郭勇先生在《山西省右玉县出土的西汉铜器》一文中介绍的几件铜器,其中胡傅浮雕温酒樽,胡傅鎏金彩绘酒樽,是令人叫绝的顶级文物。总之,朔州地区的汉墓发掘空前,它为研究汉代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从东汉晚期后再再现的三国鼎立至两晋十六国的近 200 年的时间,全国大分裂、大动荡、大灾难,民不聊生,生命涂炭。尤其是北方,受“五胡乱华”的摧残更是严重,到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在这段时间里,朔州地区几乎没有这个时期的墓葬与器物发现。就是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前期,马邑仍是一片荒凉,马邑县的建置也不存在。之后,随着时局的安定,移民的增加,经济才又渐渐复苏。后北齐建立,随着势力的扩张,朔州(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迁建在马邑废城址上,很快新迁建的朔州兴盛起来。北魏建立,定都平城,平城很快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同云岗石窟代表了当时中国雕造艺术的最高水平。北魏曹天度九层石塔的塔身现存台北博物馆,是台湾首屈一指的稀世珍宝,而塔刹现存朔州崇福寺。追溯身首异地之前的存放地,是在崇福寺弥陀殿东南隅。日军侵占时,将塔劫往日本,战败后归回又运往台湾。塔刹是在运往日本装箱时,被爱国人士隐藏起来的。据塔座题记,塔为“平城造”,其时间是北魏“天安元年”,正是在云岗石窟雕造之期间。有专家考证,石塔与石窟之石材,亦很相近。后来,为何会流落到朔州崇福寺,清《朔州志》里《崇福寺碑记(明正德年间)》有这样的记载:“至辽契丹时,其地为林太师府署。统和间,地有灵光屡见,居人不安,复为僧居,因称为林衙寺。”在等级森严的辽王朝,无特殊爵位,是不可能将寺做为“府署”。“林太师”是林衙太师之简称。“林衙”,契丹称“林牙”。“林太师”即翰林学士,是辽王朝最高爵位。辽代对功高的节度使往往另加尊衔。在辽代的朔州节度使最高的是朔州顺义军节度使。《辽史·列传二十五》记有:“耶律弘古……统和间,累迁顺义军节度使,入为北面林牙。”辽统和间曾任朔州顺义军节度使虽还有他人,而加封林牙者,只有耶律弘古。耶律弘古在朔州任顺义军节度使期间,常有宋辽之争战,他出兵大同地,乘胜将宝塔劫运到其府署,作为镇寺护府之宝,自是有可能之事。宝塔几经劫难,多被世人关注珍视,正说明了它的珍贵价值。在 9 层 2 米多高的塔四面,共雕琢佛像 1354 尊,故称之为“九层千佛石塔”。台北博物馆馆长黄永川在《关于北魏曹天度九层石塔》一文中说:“本件北魏曹天度九层石塔的创建,树立了‘中国式’塔的典型,也因其造型完美,楼楼相因,深刻剔透,乃刺激了北魏当时平城高塔建筑的风气与发展”。文中结论时还从艺术角度,提出该塔“是现存最早、最完美”和“雕刻最多佛像的作品……正式树立了‘中国塔式’的新典范”。奥地利格茨大学艺术史学院海因里奇·格哈德·弗兰茨教授在《中国塔宰堵婆(梵文译,浮图,佛塔)》一书中说:“在于它(指北魏曹天度九层石塔)是公元五世纪的唯一石塔,因在中国尚未见到公元六世纪以前的佛塔建筑。它对我们研究中国早期佛教与造塔史,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朔州文物考古文集

SHUOZHOUWENWUKAOGUWENJI

战争是残忍的,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战争又极具竞争性,它又会带来生机。北魏、北齐相继统一中国北方,在朔州地区随着战后的政权巩固,经济恢复,均有军迁、移民至朔州地区。北魏神武尖山(朔城南)鲜卑族的军旅世家贺拔岳一族四代 5 人、北魏善无鲜卑族的军旅世家库狄干一族三代 3 人、北齐朔州高车族的军旅世家斛律金一族六代 12 人等,均是随军迁至朔州地区的。2008 年,朔城区水泉梁西发掘清理的北齐壁画墓,同太原徐显秀墓接近。根据壁画和墓主人夫妇宴饮图、鞍马出行图、牛车出行图和鼓吹图等推断,墓主人应是北齐王公贵族或刺一级官吏一类的人物,其族属应属敕勒部游牧民族。在朔州地区,这是目前发掘最高规格的一座壁画墓,可惜多次被盗,器物 and 墓志无存,清理出的只是 200 多件残碎陶瓷片和陶俑残破件。游牧民族不同于中原汉民族,“死还故里”、“聚族而葬”,而是“生活于斯”,“死葬于斯”。

隋的统一,结束了国家长期分裂的状态,苛政苦役,突厥南扰,却又引发了农民大起义。李渊建立唐朝后的近 300 年时间,虽有“贞观之治”的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的太平盛世,而在朔州地区却是多灾多难,民不聊生,经济状况与人口数量远不及西汉时期。从隋末的刘武周起事、突厥颉利可汗的不断袭扰、回鹘因饥饿攻云朔,至沙陀军的反叛、平叛安史之乱等,在朔州这块军事重地上,始终有“重头戏”在演绎。1979 年,平鲁屯军沟村民在土沟悬崖上偶然发现的 69 斤多的金铤等物,即是与安史之乱有关。陶正刚研究员在《山西平鲁出土一批唐代金铤》中考证说,根据“张通儒铤”“乾元元年铤”铭文,这批器物是属于安史叛军遗物。郭子仪领军在静边郡(右玉县境)、马邑一带等地平叛叛军,叛军将领张通儒等因战败,将这些金铤器物失落于屯军沟,是很有可能之事。这批金器出土数量之多,为已知出土金器之最,对研究安史之乱的历史大动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尉迟敬德,名恭,以字行,鲜卑族,朔州善阳人,是朔州首屈一指的著名历史人物。因至勇至忠,多有故事传说和戏剧张扬,又加被民间尊为门神,所以是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关于他的家世在《旧唐书》、《新唐书》中均未提及,故有关他的出身,有“锻铁汉”、“农民”之说。从呼延塘菱先生执笔写的《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中知,尉迟敬德墓志及其妻苏斌墓志所记述的是,两家门当户对,均是三代高官的名门。又尉迟敬德墓志作“河南洛阳人也”,与志书有异。又考证说,“宋·郑樵《通志》云:‘朔州城南石碣村有鄂国公故宅,旧址尚存’,是以敬德为善阳人之佐证”。还说,“洛阳人可能是北魏迁洛阳时尉迟氏随同南迁的‘旧望’”。在《魏书·高祖纪》记有:“太和(孝文帝)十九年六月,丙辰,诏迁洛人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以此记载,呼延塘菱先生的考证是正确的,说尉迟敬德的籍贯是朔州善阳人,是无需怀疑的。

唐末,新旧藩镇林立,战争不休,相继又出现了五代短命更迭、十国分裂割据的大动荡时期。华北地区又不断遭受契丹的侵扰,其破坏与灾难更是比任何地方严重。因而在 50 多年的时间里,至今在朔州地区还未发现有这一时期的文化遗迹。北宋与辽,南宋与金,是前后两个时期南北相持的局势。宋与辽金在朔州地区为辽金所占据。辽与金的先后建立,汉族文化很快被接受。他们将本民族的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相融合,营造出了多元的新文化。契丹与女真,均是北方游牧民族,他们豪强好胜而又大气,表现在文化方面是追求宏伟、霸气、经典。从应县辽代木塔、辽代秘藏文物、净土寺金代大雄宝殿的藻井和天宫楼阁、朔城区崇福寺金代弥陀殿、辽代石雕观音站像和朔城区李氏墓地两件辽代经幢等看,均是气势宏敞的建造,或是难得一见的精品之作。建筑学家刘敦桢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中称木塔“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塔的造型和结构达到了较高水平”。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在

《中国建筑史》一书中称木塔是“国内现存最古木塔”。由于木塔的重要,研究探讨木塔的专著与文章层出不穷。本书从文物报刊和专著搜集到的文章就有 18 篇之多,涉及编写的专家及专业人员约 30 多位。在一个州里(应县当时称应州),能有如此巍峨高大的建筑,实是我国历史上的仅见,在建筑史上可称是至高的营造华章。1974 年在修木塔佛像时发现辽代珍贵文物 160 件。由于这批文物弥足珍贵,引起了文物考古界的惊异与关注,不少著名专家先后考证探究。任继愈专家说:“木塔发现辽代刻印佛经,震动了学术界”,“这是文化界的一件大好事”。宋子方专家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发现,不仅填补了我国印刷史上的空白,而且雕刻精,印刷美,绚烂多彩,十分珍贵,称之为瑰宝,实无逊色”。闫崇年专家说:“应县佛宫寺内辽代珍贵文物的发现,不仅为北京地方历史文物增添了瑰宝,而且为研究辽代南京的印刷、宗教、绘画、书法、民俗、建筑、化工、教育、文字、寺庙、科技、城市等,均提供足资据信的史料。”辽与金先后建立后,继承了唐宋文化传统,佛教也随之传播,佛教寺院的建筑,显示了各自气势辉煌的风格。从朔州地区现存和考古发现的辽代寺院有,朔城区的棣灵寺(杭芳园)、应县的佛宫寺(木塔)、怀仁的华严寺等,金代的寺院有朔城区的崇福寺、证果寺、妙因寺、广福寺、广运寺和应县的净土寺等。这些寺院,均是大的寺院,从中可知辽金崇信佛教的广泛性。从艺术来说,在继承中原文化艺术的基础上,还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把文化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巅峰。崇福寺弥陀殿恢宏的壁画、高大的塑像、精美的背光、翠绿如新的琉璃脊饰和繁复多样的棣窗,堪称为“五绝”。有的专家称弥陀殿是“金代艺术宝库”。净土寺大雄宝殿天花藻井木雕天宫楼阁,在我国古建筑中最为精美。从中我们可知,辽金承袭唐宋文化是多方面的。

五代前,中原皆土葬,至宋始行火葬,而且很快风靡全国各地。由于它的省钱省地省事和受佛教僧徒火葬的影响,及时地被辽金两朝地域所接受。在朔城区境发掘的辽金时期墓,均为火葬。在不足一米深的土坑中,常有陶瓷骨灰罐发现,显然,这是平民的火葬墓。从本书介绍的辽代壁画小型砖墓、金代 3 座家族多人丛葬墓、金代僧人丛葬墓(30 具陶棺)可知,僧人、地方官吏、富裕人家与平民,均实行火葬。可以说,辽金时期,朔州地区的火葬已是普遍流行。

在北宋与辽、南宋与金的南北相对峙期间,双方的经济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制瓷业也都有新的突破,成为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南青北白”的再现,使唐瓷落于其后,一批批新奇出色的产品相继涌现。从朔州地区辽金墓发掘情况看,凡是有随葬器物的,均有 2—5 件精美的瓷器,如定窑产的白釉印花盘、雁北地方窑产的辽代黑釉窑变鸡腿瓶、定窑产的金代白釉折枝莲印花盘、金代北方地方窑产的黑釉划花瓶等(以上器物均见《朔州崇福寺藏品精选·陶瓷篇》)。

替代宋金而起,统一中国的,是蒙古统治者建立的元王朝。雄心勃勃的蒙古统治者在执政的 70 多年,一直未停止向外扩张的野心,宋金社会的各种矛盾非但未得到解决,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激化。处于塞北的朔州地区,在元代中后期是连年自然灾害,繁重的赋税差役,成批流民在逃荒避难,无数饥民在生死线上挣扎。反映在这段历史的遗迹上,亦可印证。至元末,朔州城终因“兵少城阔,省去西北,筑东南一隅(今朔州明代故城)”。从近 30 年来元代故城内发现的窖藏,已知的就有 10 多处。无疑,这是当时民不聊生,远逃它乡的写照。

元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钧窑、磁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以及山西地方的浑源窑、霍州窑(今霍县地)等产品,在朔州地区的墓葬和窖藏时有发现。朔城区农业局大楼工地窖藏出土的青花高足杯,釉白中闪青,青花明净淡雅,人见人爱,就是产自景德镇。朔城区第四中学工地元墓出土的豆青釉小碗,釉质温润而薄,色泽淡雅而亮,体现出了元代耀州窑的风格。朔城区第四中学工地元

朔州文物考古文集

SHUOZHOUWENWUKAOGUWENJI

墓出土的仿钧釉碗,瓷胎坚致,天蓝釉质厚而晶莹,再加外壁的窑变紫红斑,近足处釉欲滴的泪痕,显得更加典雅含蓄,令人珍爱,有专家认为是山西浑源窑仿钧釉的产品。另外,朔城区曹沙会村取土场元墓出土的绞釉玉壶春瓶、朔城区农业局大楼工地窖藏出土的绞胎碗、朔州市委前修路工地元墓出土的黑釉油滴小碗等,均是产于名窑的珍品。由于元代瓷业产品大增,销售范围遍及全国,因而才有这批珍贵的瓷器流入朔州地区。

元末,蒙汉地主武装一方面在混战,一方面又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朱元璋在农民起义中发迹,推翻元朝,建立了以汉族地主阶级为中心的明朝政权。在这争战和夺权的过程中,到处是屠杀抢掠,尤其是在中国北部,“多是无人之地”。朱元璋为了巩固新建的政权,于明初采取了不少“安养生息”的措施。在朔州地区有大批移民迁来,安宅垦荒。之后,蒙古的残余势力乘机再起,势力又逐渐强大起来,不断向北部地区袭掠。在朔州地区虽全面实施卫所制度,外有长城屏障,关隘防护,内有堡城遍地,烽台相望,形成回环盘护的军事防御体系,然而在明中期之后,瓦剌、鞑靼、俺答诸部落对朔州地区的进犯一直在继续,它给当地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反映在历史遗迹方面,远不及辽金时期和其它临近地区。在这一时期,要说珍贵的文物,当数朔城区西关社稷坛遗址窖藏发现的 17 件珐华塑。珐华,又称珐华三彩,或法华。始于明代,盛行于晋南一带,是一种特殊的陶艺。常见的多是香炉、瓶、罐或动物,人物较少见。这批珐华塑有 16 件是人物,其中有 4 件乐舞人物,塑技精湛,造型生动,表情诙谐,素淡典雅,是珐华人物塑顶级之作品。研究介绍碑碣的两篇文章有《明朝学规禁例十二条》、《明长城碑记》。明洪武十五年皇朝以碑碣形式颁布行学规禁例,印证了明初重典治国治学的法令。强行全国施行,在选拔人才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明代修长城碑,在山西省是首次发现。碑文记述的是“修工旗军一千五百七十九名”,“修石墙八十三丈(约 200 多米)”,“通高三丈”,“外面石砌”。从《读史方輿纪要·山西部分》知,这一段长城是在神池堡北,“弘治二年筑,嘉靖二十七年、万历四年增修”。碑文最后书“万历三年九月初三日立”。碑发现于神池堡北的石湖岭村一带的长城脚下,处于山区,墙体土垒,外面石砌。碑文与长城遗迹正和以上文献相吻合。碑文只 115 字,它却是万历年间修筑内长城的真实档案,对研究我省明代内长城的修筑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满族统治者取代明朝建立清朝后,全国亦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朝代。在朔州地区,清早期是顺治的大同总兵姜壤叛清,清多尔袞讨姜壤,朔州抗清遭屠城。到清中期后是相继出现的水灾、旱灾、瘟疫,有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饿殍盈途,人相食的残景,因以丁丑年(1877 年)、戊寅年(1878 年)最为严重,河南山西灾情最深,故时称“丁戊奇荒”、“晋豫大饥”。“奇荒”“大饥”很快引发了山西灾民大规模“走西口”迁往内蒙的浪潮。“走西口”移民实际上从清早期就已出现。刘平柳亚平教授在《“走西口”文化形成的社会背景》论文中说:“走西口从清初开始,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十年九不收’的晋陕北部民众越过长城,开始大规模向地理条件优越的蒙地迁移。”张喜琴博士生和刘建生教授在《“西口”考辨》论文中又说:“走西口包含了无数商人和农民远离家乡、去口外谋生的艰辛与凄凉,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社会现象迅速带动北部地区商业贸易往来的深刻发展,对于促使口外地区与内地经济一体化、繁荣社会经济生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朔州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在特殊的时期形成了它自身的文化圈。历史上做为肩户、通道、桥梁和纽带的西口,清以来,官府戍边和设卡税收,民间的谋生或贸易往来,形成了这里“南耕”“北牧”共塑的西口文化。西口文化与这两种文化既有着同一性,又有着差异性。西口文化是一种多元的复合文化。近几年来,右玉县将西口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多次举办文化论坛,深入研讨、挖掘其

文化内涵,它丰富了近代蒙汉回等民族的文化融合历史。西口文化的形成,是我国各民族大团结、“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缩影。

光绪年间,朔州城出现了一个榜眼王赓荣。他是朔州明清以来获得科举的最高者。由于他“尤精书法”,在朝多与文人墨客交往。《朔州崇福寺藏品精选》中的一批名人书画作品,多是他本人和同僚的赠品。其中楹联有状元东阁大学士陆润庠、状元知府王仁堪、状元侍读学士黄思永、洋务派首领全权大臣李鸿章,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祁隽藻等。另有状元曹鸿勋书的12条祝寿文(为王赓荣母祝寿),笔法秀丽谨严,装裱缜密堂皇,亦是不可多见的精品之作。

本书收录的资料,反映出的只是朔州地区文物古迹的一部分,其中,还有不少重要的尚待揭示探究。有的资料还只是一种介绍,其深厚的文化内涵还需进一步钩沉考证;还有许许多多的珍贵文物深藏锁在文物库房,未被去解读。历史在我们的脚下延伸,一些湮没于地下的文物古迹,还会陆续出现。保护和发掘文物任重道远,不断去解读文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相信,若干年后,还会有一批批文物考古的专著和文章面世。我们今后也会拭目以待《朔州文物考古文集》的续集能够再现于世。

尽管我们收录的文章有长有短,有深有浅,零零碎碎,如若把它缀合起来,反映出的历史却是有血有肉,生动形象。从时间发展序列宏观,我们捉摸到的是朔州历史由简到繁,前后承传的发展脉络,窥视到的是朔州历史文化独特的风韵。

但愿我们的初衷与构想能够如愿。

选编 雷云贵

目 录
下 册

序
导读

李 尧
雷云贵

器 物

山西右玉县发现青铜簋
朔县赵家口发现战国剑
山西省朔县出土“宋子”三孔布
平朔出土几面精品战汉铜镜
山西省右玉县出土的西汉铜器
山西朔州出土古印选介
西汉雁鱼灯
两件水禽衔鱼缸灯
西汉组合铜灯
四神染炉考辨
火锅雏形
——西汉四神铜染炉

右玉县文化馆
高士英
朱 华
冯国梁
郭 勇
雷云贵
雷云贵
孙 机
雷云贵
宁立新 杨纯渊
雷惊春

朔州文物考古文集

SHUOZHOUWENWUKAOGUWENJI

汉代铜镜佼佼者：星云纹镜	雷云贵
精美绝伦的嵌贝铜龟镇	刘元
山西山阴发现两件汉代五铢钱铜范	贺仰文 刘迎春
浅谈朔县出土的五铢钱	朱华
山西朔县西汉墓出土吉语钱	朱华
俳优镇与乐舞伎	雷云贵
东汉的一件骨尺	雷云贵
剪纸先驱	
——汉代金箔饰片	雷云贵
西汉出土荞麦竟发新芽	雷云贵
山西平鲁出土一批唐代金钹	陶正刚
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辽代珍贵文物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 山西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 山西省雁北地区文物工作站 山西省应县木塔文物保管所
笔谈山西应县木塔辽代文物	任继愈 陈述 苏晋仁 朱子方 王尧 闫崇年 冯鹏生 罗炤
应县佛宫寺木塔发现的辽代俗文学写本	史树青
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	张畅耕 毕素娟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的《契丹藏》和辽代刻经	闫文儒 傅振伦 郑恩淮
辽画《神农采药图》	炳文
世所仅见的辽版书籍	
——《蒙求》	毕素娟
应县木塔秘藏辽代美术作品的探讨	侯恺 冯鹏生
《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考	闫文儒
应县木塔发现《契丹藏》	郑恩淮
让文物瑰宝再现生命	
——修复应县木塔辽代经卷、画幅的体会	冯鹏生
一件元墓出土的绞釉玉壶春瓶	雷云贵
山西右玉宝宁寺水陆画	吴连城
应县木塔发现的明永乐二十年大布告	郑恩淮
山西朔县出土明代法华塑	雷云贵
“福禄寿财禧”花钱的文化内涵	雷云贵

『目 录』

石 刻

关于北魏曹天度九层石塔	黄永川
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	史树青
谈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题铭释义	胡顺利
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塔刹	韩有富
分离两地的千佛石塔	徐云霄
北魏曹天度千佛塔身首分离七十载 ——海峡隔不断文化牵挂	李 尧
朔县辽杭芳园栖灵寺碑考	张畅耕
辽朔州李氏墓地经幢	孙学瑞
辽代朔州高氏的两方墓志	刘俊喜
金朔州马邑县桑乾神庙碑考	雷云贵
金代张温夫妇墓志及相关问题	张学瑞
金代正隆始于甲戌年 ——兼介大金李汝为墓志	高平如 王凤岐
朔州发现的洪武十五年卧碑浅析	孙学瑞
山西朔县发现明万历三年长城《碑记》	雷云贵

考 辨

大同湖 ——雁北历史上的一个湖泊	卫 奇 张畅耕 解廷琦
朔县战国秦汉墓若干文物与墓葬断代问题	黄盛璋
“贵海”铜印释文正误	张 颌
怀仁日中城即汉蓟阳城代公新平城考	支配勇 雷云贵 张海啸 支建平
朔县王隆墓	信立祥
西汉男女同棺合抱葬式谜解	雷云贵
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节选)	李文杰
杨业被俘之地考辨	雷云贵
尉迟恭籍贯辨析	雨 田
“西口”考辨	张喜琴 刘建生
“走西口”文化形成的社会背景	刘 平 柳亚平
农耕与草原共塑的西口文化	雷云贵
雁门关下古战场	师振业

朔州文物考古文集

SHUOZHOUWENWUKAOGUWENJI

附录

朔州文物考古专著目录表

朔州市的国家、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后记